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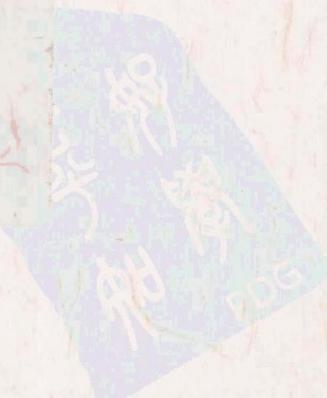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

[美]白桂思 ◎著 付建河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

[美]白桂思 ◎著 付建河 ◎译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PDG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
(美)白桂思著;付建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9
(《新疆通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5776-1

I .①吐… II .①白…②付… III .①吐蕃-民族历史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1142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H 月第 I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十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前 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公元前 60 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次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从那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 年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翻译一批外国学者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期,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就在新疆地区交融,众多古代民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积淀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新疆已经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新疆丰厚的历史文化逐渐为国外学者所了解。来自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的各种名号不一、目的不同的探险

队、测量队和考察队，陆续走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当时，这些探险队在亚洲的中部，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发出有惊人发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被视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竟然会埋藏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写在木板、桦皮和纸张上无人识读的文字，有令世人惊叹的佛教石窟壁画，有雕刻各种精致花卉文饰的木器，有早至战国时期内地生产的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雕塑以及漆器、铜器，有中国汉唐时期以及古罗马、波斯制造的各种钱币等等。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灿烂的古代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西方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取得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历史、中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如今，他们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新疆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与他们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吸收他们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编写好《新疆通史》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邀请有关专家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翻译丛书”公开出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大家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多角度、全面地了解、认识新疆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序 言

序
言

就我所知而言，在所有语种的相关著述中，本书是第一本详细叙述吐蕃王朝在中亚活动的历史专著。如果确实如此，似乎就没有必要回顾此前的研究状况。然而，欧亚大陆范围辽阔，拥有众多历史学家。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写过关于欧亚大陆历史某一侧面的综合性著述，往往涉及到吐蕃。我写这篇前言过程中，对这一类著作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些藏学专著。

吐蕃史研究还难说成熟。现有的少数与吐蕃早期历史相关的著述充其量是缩略提纲，或者充满各种神异的解释。有鉴于此，也是因为我更倾向于从原始材料中获得自己的认识——而不是依靠早已过时的或者不科学的著作——所以我决定尽最大可能地依据基本史料，虽然它们对我来说是如此生疏。我已经参阅了现有的几种较新的关于吐蕃早期历史的广博研究，将在脚注和参考书目里注明。但是参考先前学者的相关论述之处没有一一说明，即使我的解释与他们的完全不同。当然有一些读者会觉得多有不便，但我认为对一部远非完善的著作来说，这种不可避免的粗疏应该是可以容忍的。

本书的初稿在 1983 年夏末完成。当时我曾设想在修订的过程中，将忽略任何一种此间可能出版的有关著述或者此前我没有注意到的相关成果。然而，那年秋天，我的同事伊利奥特·史柏林慷慨地送给我一本十分有价值的《册府元龟》吐蕃史料的汇编，是由苏晋仁和肖练子编著，1982 年在成都出版的。次年春天，森安孝夫又惠赠他在该年发表的关于吐蕃帝国

在中亚历史的重要文章。那年夏天，在我修订书稿的时候，尽可能地参考了这两部著作。到1984年春天为止，有若干出版于1983年或更早一些的著作我还未曾获读，或者根本不知道，因此，除极少数例外情况，我所参考的最新资料限定为上述两种著作。

如前所述，在写作此书的早期阶段，我就决定通过解读原始史料而达到目标。然而，在中古早期东方历史的研究领域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原始资料，那些历经磨难残留下来的资料，大多都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很久之后，用诸如古藏文、阿拉伯文、古突厥文和汉文撰写的叙述性报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阿拉伯文和汉文材料的手稿或印刷品近来才为人所知，而且容易得到的只能是整理版本，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因此，除了我不能见到原始语言文本的部分资料之外，我的所有解释和结论都是基于阅读原始史料，至少也是精校转写本的。然而不管我是如何挑剔或者忽视他们的成果，我对致力于整理这些原始材料的前辈学者，对力求解释这些材料的早期通史作者都是感激不尽。

下面对写作本书过程中采用的叙事方法特别作一说明。首先，本书的叙事基于司马光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和敦煌所出佚名的编年体著作《古藏文编年史》。我使用前书的方法是略读来寻找专有名词，凡是遇到与内陆亚洲直接相关的名词，我就阅读该篇目并做广泛的摘记。其后，我将这些摘记与官修唐史——《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基本编年部分（“本纪”）和其他汉文材料加以对照。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增加取材于其他文献的相关信息。这些文献包括《古藏文编年史》、《古藏文年代记》，古突厥碑铭，阿拉伯历史学家泰伯里、白拉祖里、伊本·阿泰姆·库菲和阿兹拉克的著作。最后我参照沙畹、吉布、沙班、马克拉斯、佐藤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修订。由这些摘记构成了本书的基础文本。

对非汉文材料，我已经通读了全部《古藏文编年史》和大部分的《古藏文年代记》。特别感谢赫玛特·霍夫曼教授。这些文献本身就非常迷人，而与教授共同研读其中的若干篇目更是其乐无穷。承他惠借缩微胶卷制作的照片使我得以复核这些材料。（这些胶卷是对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帮助石泰安教授那段愉悦经历的回报）我已经阅读了古突厥碑铭中所有看来

与此相关的部分,包括暾欲谷碑的原文和其他碑铭的译文,然后利用特勤公布的转写和翻译进行了校对。我还阅读了我能发掘到的阿拉伯文的所有相关篇目。我搜集此类文献的方法一方面是通过索引,另一方面是借助巴托尔德、吉布、沙班和另外一些人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我错过了阿拉伯文历史著作中某些重要材料——特别是泰伯里和伊本·阿泰姆·库菲的著作——因为我发现很难通过浏览阿拉伯文文本来寻找专有名词,而我没有时间去阅读数以千页的文本来搜求几条先前没有被注意到的有价值的史料。

在结论部分中,笔者试图将这段史实与人们熟知的中古历史领域联系起来思考。对于广为接受的中古早期欧亚大陆历史的现有结论来说,本书的观点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在传统观念中,吐蕃的影响被想当然地限定在“中古早期世界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范围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看起来像是中古早期中央亚洲的全史,然而它不是。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观念认为没有足够的传世史料可以用来写一部那样的历史,而实际上,仅就八世纪五十年代的帕米尔地区就有多种语言的原始和二手资料大量存在,足可以构筑一部煌煌巨著。不仅如此,除了回鹘历史,几乎其他所有相关领域都有待开垦,特别是从750年到850年间的这段历史。我真切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后来诸君能够发现和改正本书的一些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研究的深化,从而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最不济,这本小书能够增进人们对吐蕃和中亚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伟大角色的理解。

致 谢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本书工作的人们。最主要的是我的老师和朋友，特别是赫玛特·霍夫曼、图登吉美诺布和伊利奥特·史柏林。海外的几位同行，尤其是森安孝夫、盖泽·乌瑞，我的学生和朋友武内绍人都给予慷慨的帮助。感谢古斯塔夫·拜尔勒和丹尼斯·塞诺，使我保持学术讲席并获得经常性的暑期经费支持。

此外，我要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两位绘图员罗杰·珀塞尔先生和约翰·霍林斯沃斯先生，他们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地图。我也要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科研和学位办公室，它使我在 1982 年获得一个夏季学院的特别研究员席位，并得到专项资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密特卡仔细审校了原稿，他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康妮，我的女儿茗和我的儿子李，他们的配合让我在家中也得以进行此书的写作。

关于东方语言的转写和翻译的说明

对于那些有确定英语拼写形式的专有名词,对于那些沿用至今因而有现代拼写方式的地名,对于那些已经为人熟知的外来概念(比如“khan”),在一般情况下我保留其传统拼写形式。在有些场合,我沿用惯例使用现代而非中世纪地名,例如用阿克苏,而不用拨换。对其他术语,我按照以下规律进行转写。

藏语:k,kh,g,ñ,c,ch,j,ń,t,th,d,n,p,ph,b,m,ts,tsh,dz,w,ž,z,‘,y,r,l,ś,s,h,’。(最后的这一喉塞音符号只在有可能产生模糊歧义的时候使用,一般情况下不作标注。)末尾的^a chun 转写为“á”。我遵从约定俗成的辅音和元音的使用方法,但是,我是把它作为一种语言用心转写,而不只是将其当成一连串毫无关联的字符组合而加以生硬笨拙地任意宰割——比如在单词中间使用大写字母。因此,我将藏语词汇当做词汇来书写。这一独特的方式可能对一部分藏学专家读者而言很难适应,因为就我所知他们都是对藏语进行“严格音译”(既不严格,也没音译。即使希腊语也不能靠通常的音译来重构,除非你对该语言略知一二)我在转写藏语单词的时候所遵循的两项原则是:

1. 如果前一个音节以元音结尾,接续下一个音节的时候不用连字符。如果是辅音,为避免在某些场合下可能产生歧义,就使用连字符。
2. 所有后缀或附属词素(语格后缀,名词性后缀等)与前面的音节之间不用连字符,不管其是否以元音结尾。

也许使用这种转写体系能有助于清除仍然广为流行的无谓观念：藏语——像日语一样用单音节拼写——应该马马虎虎地被认为是一种“单音节语言”，与通常公认的古典汉语相仿佛。

阿拉伯语：'，b，t，th，g，h，kh，d，dh，r，z，s，š，š，d，t，z，č，gh，q，k，l，m，n，h，w，y。Alif maqsūra 转写为“á”。如果给以“严格”音译，alif 转写为“â”，而不加点的齿音(b、t 等的字根词素)转写成句点(“.”)。

汉语：现代汉学家习用的经过改良的威妥玛拼音依然保留。注意，只有英语转写体系能正确地表示现代普通话(缺少正常浊塞音)中起始的爆破音音值。

突厥语：a，b，c，d，ä，e，i，ϊ，gh，g，q，k，l，m，n，ń，ng，o，ö，p，r，s，š，t，u，ü，y，z。在决定是否用“s”或“š”转写突厥词汇的时候，我一般都遵循汉语证据——只要能找到实例。一些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大量来自汉语文献的突厥名称以突厥语形式呈现出来，而不是以二十世纪普通话拼音形式表现。虽然有一些重构也许会弄错，但是我决心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恢复其本初的形式。我欢迎那些不同意我所重构拼写的人来验证并提出自己的方案，所有从汉语中重构的词汇前面加星号表示。在这种重构明显一致——比如汉语 I-nan-ju = 突厥语 Inancu——或已经广泛为人接受的情况下不加星号，也不做进一步解释，更有疑意的词汇则保留其汉语形式。

所有东方语言文献的翻译都出自我自己之手，少数例外的地方分别加以注解。只有当我的翻译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和其他人的翻译稍有不同的时候才采用别人的译文。我的译文在许多地方与先前学者的译文当然非常接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大量引用诸如《唐书》吐蕃和突厥传的时候，我没有一一标明相关权威译作的文献出处。如果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将所谓权威译作与我的译文加以比较、商榷。

关于纪年法的说明

中世纪作者们的纪年法与我们今天的旨趣不同。了解这一点对更好地理解本书叙事所面临的纪年问题很重要。事实上,中古历史学家对于纪年的观点和目标与我们截然不同,以至于间或有不可理解之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也是因为方法的巨大差异,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在现代读者看来最重要的地方,中古历史学家反而略而不谈。更严重的是,大批重要的原始史料在中世纪即已逸失。结果导致,例如,在各种资料中对某次行军的结局都没有记录;本次行军的领导,或者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它发生的确切时间,我们都无从知晓。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尽可能给出事件发生的最精确时间,但往往因无从考证而作罢。

不仅是时间阙载的问题,更麻烦的是,本书赖以叙事的各种东方文献都是用阴历,它们之间互相抵牾,与西方历法也难以匹谐。幸而,古藏族和古突厥的动物纪年与汉族的生肖纪年大致相当。一般情况而言,中国和伊斯兰历日可以根据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1972)互相转换。然而仍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事例,不能对其进行简单转换,对藏语和古突厥文所述事件断定日期尤为复杂。

一般认为唐朝史料纪时方法是:记录下的只是某件事情报告到朝廷的日期。但即便不能说没有,也很少有证据支持此种说法。举例来说,在帕米尔地区的一次军事集结的时间几乎不可能被记录为远征结束汇报至长

安的日期。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知道唐朝的军队里都配有帝国行政官员，而他们的职责就包括保存行军记录。看来另一种假设——正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中古中国历史学家所采信的——更符合实际情况：唐代编年文献所记录的事件日期应该就是其实际发生的时间，除非文献记载能使你相信其他情况的存在。

另外，经常采用回溯既往的叙事方法也导致汉语文献使用难度增加。这种回溯是对某一事件来龙去脉进行总述。从最近的事件开始（但这一点常常被略而不叙），在没有什么醒目提示的情况下以编年的形式叙述史实背景，然而又经常缺少确切的日期。

古藏历也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很显然它与汉族历法和后来藏历根本不同。据一则汉语文献记载：“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①这在中古历法中当然并非罕见，但缺乏精确日期阻碍了我们对古藏文政治史重要文献《编年史》的理解和使用。这部文献只是简单地以羊年，相当于公元671至672年，某一季节作为其叙事的开端。在本书中，通常设定《编年史》中的“夏季”约略相当于西历的后半年，“冬季”则指前半年。（因为很遗憾的是，如果太过严格地要求叙事的时间，将有许多事件的时间被搞错。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采取比较宽泛的标准。）在《编年史》中只有很少的素材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决定如何按照事件顺序解读叙事。更有甚者，《编年史》的残破导致大部分年份名称逸失，而且也打乱了编年顺序。关于这部文献中的日期问题将在行文中分别注明。

阿拉伯文献中的纪年很少有技术性问题，但麻烦的是普遍地缺少精确日期。一般来说，表述一个事件的唯一时间是伊斯兰历的年份，而这种阴历年通常是跨西历的两个年头。很明显，从这种著作中得出的历史时间通常是不精确的。

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突厥碑铭还应得到更彻底的调查研究。除非如此，从碑铭内容中可能推导出的纪年仍就是不确定的。简而言

^① 《新唐书》卷216上，第6073页。

之，碑铭标志时间的是该人建功立业的年龄，偶尔也会根据动物纪年的周而复始来表示时间。其结果，某一实际给出的日期通常是从特定人物逝世的时间回溯推算得出的。既然碑文不会一一给出碑主每次建立功勋时的年龄，因此经常需要另行补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不精确的时间表述。

目 录

目
录

序 言 / 001
致 谢 / 004
关于东方语言的转写和翻译的说明 / 005
关于纪年法的说明 / 007

绪 论 / 001

帝国时代之前的吐蕃和中亚 / 001
第一章 进入中央亚洲之路 / 005
第二章 吐蕃帝国的西进 / 023
第三章 大食和西突厥人 / 036
第四章 突骑施联盟 / 058
第五章 唐朝和大食 / 076
第六章 后期帝国 / 102

结 论 / 125

吐蕃与中世纪早期亚欧大陆 / 125
智识和文学活动 / 131
建筑 / 132
技术 / 133

经济 / 133

政治活动 / 137

附录 / 142

附录一：关于吐蕃统治的程度 / 142

附录二：关于古藏文文献中的上部地区 / 146

附录三：关于突厥王族 / 147

附录四：关于十箭 / 149

附录五：关于拔汗那国王阿了达 / 150

帝王年表 / 151

术语表 / 155

唐朝官职 / 155

常用唐代地理术语 / 155

汉语名词 / 156

文献综述 / 167

译名对照表 / 177

文献索引及缩略语 / 203

古典和中古文献 / 203

杂志和文集 / 206

研究论著 / 207

绪 论

绪
论

帝国时代之前的吐蕃和中亚

3

神秘的族群起源问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致力于此。然而,现在普遍承认,把史前考古遗存比定为今天操特定语言族群的尝试,即便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事情。^① 对藏族来说也是如此。最近的考古发掘显示,西藏地区在遥远的史前时代,至少从细石器和巨石文化时代开始,就有人类活动,还不清楚这些早期藏地居民属于什么族群。有关藏族与亚洲其他众多民族种族联系的理论其实出于对藏语和亚洲其他语言关系的推测,朦胧模糊,东拼西凑。^②

环绕西藏的语言语种是:在南方和西方是印欧语;在北方和东北方是突厥语和蒙古语(在古代是印欧语);在东方是汉语;在东南方是缅甸语(在古代还有泰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等)。因此,就其所处的位置来说,藏语看起来可以和任何可能的语族(如果有的话)相联系,而不仅仅限于汉语。即使对这一语言仅仅略知一二也能使人猜想到它与印欧语言和

4

^① 有关吐蕃王朝兴起背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拙著:白桂思(1977)。关于西藏地方近来考古发现的情况还没有一本便利的书或概述性文章可资利用。

^② 译按:该注释是对藏语语源的讨论,较烦琐,且与全书主旨关系甚少,故从略。